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的博弈*

——以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为例

于文浩

摘　要　本文运用中日两国史料，从民间经济外交的视角，对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做了考察。笔者认为，此次抵货运动，是中日双方商人团体及其政府间的一场博弈斗争，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日方占有主动性，中方处于被动地位的不平衡性的特点；二是具有从中方“抵制”到日方“反抵制”再到中方被取缔的双重性的特点。此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和经济效果，但是中国商人团体运用民间经济外交手段，作为政府外交的后援补充力量，对日本政治经济侵略给予了积极的反击。日本商人团体通过民间经济外交手段，间接参与外交事务，起到了推动日本对华政治经济侵略扩张的作用。可见，民间经济外交对本国政府或他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是政府外交强有力的补充，发挥了强有力的监督作用。

关键词　抵制日货；博弈；民间经济外交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10－0139－07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10.021

作者简介　于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836

1923年，由于日本政府援引“二十一条”，拒绝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中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界大多从商会史、反帝爱国运动史和中外关系视角做了论述，或注重考察抵货运动的演变过程，或着力强调各团体在运动当中的言论作用，且偏重对中国商人单方面的活动分析，缺少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博弈的视角进行分析的专题研究。本文从民间经济外交博弈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中日两国史料，对中日两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国内和日本展开的民间经济外交活动进行历史考察，对双方的博弈效果、特点和作用做出概括，以期丰富和深化此领域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商人团体的“抵制”运动

1923年3月14日，日本拒绝中国政府要求收回旅大的照会后，激起了商人团体的愤慨，各地纷纷成立各种组织，提出以抵制日货甚至经济绝交办法来对抗日本。

上海总商会于3月24日召开市民大会，决定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3月25日晚，上海商界正式作出了抵制日货的决议。各路商家门前纷挂白旗或白布，上书“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①为推进运动的进行，全国各地于3月26日旅大租借期满之际，举行游行示威运动，有人数记载且达万人以上的城市包括上海、天津、武汉、长

*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特别资助项目“民国初期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以商人组织为主体”(201003209)的阶段性成果。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沙、广州、太原、南昌、宜昌、济南、开封、厦门、徐州、安庆、镇江、芜湖，共十五个，其中，长沙的参加人数高达 6 万人之多。[②] 无人数记载的城市尚有三十个左右，抵制日货运动正式开始。

4 月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人团体不但加大舆论宣传力度，还纷纷制定了详细的抵制计划。商总联会提出赶印“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务要收回旅顺大连”之通告二十万张，分寄各省区县，代为分贴，以醒悟国民。[③] 并制定了初步的经济绝交办法三则，“(一) 不进该国之货，(二) 不搭该国轮船，(三) 不流通该国货币”。[④] 还加强各公团的协助进行，认为“沪上最好由永安、先施两大公司首先发难，一致表示不买日货，并请其他有名望商号相继提倡，比较容易进行”，公决派委员二人向该公司接洽。[⑤]

在加强国内抵制日货运动的同时，上海总商会还致函日本商业会议所，指出“如果所谓中日共存共荣者，而果出于贵国人士由衷之心理，则威胁条约之宜破弃，旅大租借地之宜按约交还”。[⑥] 日商会复函称“此种既经决定之事项，辱荷指陈，深愧无以报命”。[⑦] 上海总商会表示，“吾人对于日本国民之为难情形，自亦当加以曲谅，但因此又可证明此种遗大投艰之责任，全在我国民之戮力同心，而决非徒呼将伯所可奏效，前途辽远，责无旁贷。”[⑧]

4 月 7 日，各团体各商帮公所及公司踊跃推派代表参加市民大会，并正式通过了包括从日货进口、销售、购买等环节上采取对日经济绝交的计划大纲，将抵制日货运动引入了深入的发展阶段。[⑨] 由于“日本年来对外贸易跌落，今年首季对华贸易，又复入超”，日本对此“颇多悲观”，呼吁“足资吾国工商界之注意”。[⑩] 美报社评论道“倘华人排货运动扩大，则下季中逆差势必加甚，无怪日人恐慌也”。[⑪]

随着抵货运动的深入，5 月中下旬，日本驻华公使和大使数次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取缔排日运动。[⑫] 沪上各商人团体认为“我国对日外交，日形危急，若非国民自决，而专望政府，恐终不能如愿以偿也”。对于抵货过程中凸显的矛盾及时地做出调整，无论从舆论还是从采购、流通等环节，制定更为严格的抵制措施，决定“调查现存日货，以便设法公卖。”[⑬]

与日本官方相呼应，日商人团体“设计勾结我国驻日商人，诱以重利，将大宗货物，运销我沿海各埠，藉达破坏目的等情”。对此举，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函留日学生会“知照在日各地留学诸君及华人商业机关，一致动作，俾得贯澈主张，藉伸正义”。[⑭] 随着日本总领事频频函请设法劝阻排日抵货会等，上海总商会表示“纯为商人营业之自由，非任何势力所能左右。即便为过度之压迫，得以一时弥缝无事，亦如读卖新闻社论所谓，祸机愈酿愈烈，决非两国商业前途之福”。[⑮]

在日本官商双方的外交压力下，北洋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抵制日货加以干涉、压制直至最终取缔。在内外交织的强压下，抵货运动有所缓和并持续到 8 月份。加之商界愈发认识到为从根本上抵制日货，更应推动国货的产销，将提倡国货看做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另一种经济手段，重心工作也渐次从直接的抵制日货运动趋向于提倡国货活动上来。8 月 17 日，上海总商会为欢迎先后莅沪的各省区后援会代表，以及留日学生代表，特致函入会各业代表，请其参加定于八月十九日在总商会举行的欢迎会，会上当就“提倡国货奖励生产”进行讨论。[⑯]

二、日本商人团体的“反抵制”运动

面对中国商人团体主导的抵货运动，日华实业协会深为不安，认为抵货运动不仅“危及到我在留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且“本应阻止此等运动的商务总会，却成了运动的主导者”，建议“就根本的防止对策，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再因“寄希望于以稳健、持久的态度来圆满解决此事，而不仅只是扫清一时的骚乱”，决定“和中国各地、日本全国的商业会议所，以及各种实业组织紧密联系，为防止抵制日货而尽全力”。[⑰]

为取得政府外交的支持，日本商人团体运用民间经济外交手腕，在日本本土及中国展开了一场“反抵制”运动。[⑱] 6 月 11 日，日华实业协会正副会长拜访外务省内田外相，由外务省给北京代理公使发去训电“眼下采取强硬的态度，今后的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策也要做到无遗漏。”[19]协议会议决“除与全国及中国各地的商业会议所、各种实业团体取得联系外，为彻底寻求防止排日、抵制日货运动的对策，需要再次会见外务省当局”。[20]并决定“促请日政府向中国当局提出打消此项运动”，同时正式呈递首相、外相及农商大臣。[21]

神户商会于6月中旬提出“反抵制”措施，要求“日政府立即设法阻止华人之抵制运动”。[22]日华实业协会议决：“(一)日本政府不与中国中央政府为对手，直接对地方官员予以严厉抗议，因排日运动所导致的损失，令地方官宪赔偿；(二)借款如到付还之日期，即无犹疑收取；(三)将排日损失额报告北京公使馆，以为交涉之基础；(四)我国(日本)断乎实行经济绝交，以期根本解决排日问题；(五)日本不出席特别关税会议，更不加入司法制度调查委员会，终止对华文化事业之支援；(六)促日本居住之内地中国人反省”。[23]

6月28日，大阪商业会发起“对华问题实业大会”，参加人数多达3000余人。大会认为若不解决抵货运动则“吾贸易上，万无宁日”，建议“由海军部派遣多数军舰，驻扎长江一带，及中国沿岸，使陆战队上陆……可不谓之曰以武力压迫，而曰保护侨民”。[24]

7月，日华实业协会提出：(1)禁止抵制日货运动，(2)处罚抵制日货责任者，(3)赔偿损失，(4)善后保证等四点措施，并取得了日本政府的同意。[25]还多次为在华日商提供与政府、贵族院各团体、各政党干部及商业会议所等机构直面陈情的机会。[26]汉口日商认为抵制运动，“从小处来看，将减弱长江中游以上日本人的势力”，“从大处来看，将使数十年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开拓出的华中大后方事业蒙受莫大损失，于恢复帝国国力方面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27]因此，日华实业协会决定：对于政府当局要求处罚对排日行动不予取缔的中国官绅，附上取缔排日运动、赔偿损害、善后保证等要求；为保护日本人增派炮舰若干，配置相当人数的陆战兵，以便于不失去保护和镇压的时机；对中国文化事业及其它方面的支持，至排日运动结束前一律予以中止。[28]并称抵制运动“阻碍了我们的事业推进，国家应对此担负起责任”。[29]

为防止抵制日货运动的再发生，日华实业协会认为“今后于两国实业家的提携以及促进贸易的同时，还要探求如何将排日风潮做到防范于未然，发生事故之际，如何对在华日商进行救济”，[30]并加大了对华文化教育事业的渗透。如为上海中华学艺社设立大学给予15000日元的资金援助；[31]派干事角田隆郎来华与官商学界人士交换意见，提出设置友好交流机构，实现意识沟通；[32]为在改善对日舆论方面做出贡献的《中报》给予援助等。[33]

三、政治经济博弈的效果

作为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手段的“抵制”与“反抵制”运动，实际是中日双方商人团体及其政府间的一场博弈斗争。欲考察这场博弈斗争的效果，需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作为民间外交所具备的政治效果，另一方面是作为民间外交所具备的经济效果。

政治博弈方面，日领事曾于4月下旬要求将取缔抵制日货方针“除分行各区警察署外，相应函至贵商会查照”。[34]因当时北洋政府对于民间经济外交运动尚持支持的态度，对日领事的要求没有给予回复。5月12日，日驻华公使吉田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提出对排日运动“严加取缔”和“损害赔偿”。[35]5月下旬，日驻华大使饬令驻沪总领事设法向各国领事及中国政府，要求严厉取缔排日运动及抵制日货等，并要求将宣传排日运动之公司团体一律发封。[36]6月15日，吉田再次照会外交部，“若地方官之取缔依然缺乏诚意，致难期日本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时，日本当执临机适当之处置。”[37]8月6日，芳泽公使提出正式照会“如政府屈从其请，彼则成我政府，否则将出以所谓自己的手段，藉以表示否认我政府之意”。[38]

在日本政府及日本商人团体“反抵制”的紧逼之下，北洋政府对抵制日货的态度由开始的支持、默许转化到压制，最终至取缔。运动初期，顾维钧外交总长表示，旅大问题日政府若肯让步，则风潮不禁自消。5月12日，吉田与北洋政府交涉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后，外交部要求内务部“察核办理”，内务部“密行各省区暨京召尹、京师警察厅转伤所属，对于此项情事，随时劝戒防范”。[39]长沙事件后日本增派军舰来华时，外交部再次致内务部“知照各省区地方军民长官，加意维持秩序，并劝阻排日举动，以免国际纠纷”。[40]

在政府施压以及在华日本商人团体的分化瓦解之下，商会的抵货态度也日趋软弱。7 月 24 日，中日实业界代表第一次会谈，日方称“中日两国无论有何问题，均可研究”。[41]8 月 1 日，卞月庭代表商界希望日本商界促进日本政府“变更对华方针”，同时呼吁中方“停止对日不良举动”。日方代表对此表示赞同。[42]8 月 20 日的中日国民大会上，卞月庭“恳请贵国诸大绅商转请贵政府变更其侵略之政策，同人亦当劝告弊国民取消抵制行动”。[43]9 月 1 日的第二次中日恳亲会，双方与会代表又有增加，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于我国无丝毫之利，而与日本有莫大之益，抵制缓和，此会之大功也”。[44]

经几次中日恳谈会，日方认为“伴随双方交流的加深，当地报纸上的过激论调踪迹消失”，而最令人欣喜的是，“因日中恳谈大会的召开，有望建立一个以商业会议所和总商会为主导的由日中各界精英组成的日中联合会。”[45]

由于日本商人团体通过与日本政府加强联系，使得民意得以传达，再经由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化成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传达到中国商人团体，最终转化为抵制日货运动被取缔。可见，中日双方的这场博弈，在官府的压制以及商会的妥协之下，抵制日货运动正式被取消，此次运动并没有实现预期所要达到的政治效果。

经济博弈方面，可以结合中日两国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从图 1 可知，在抵货运动进行中的 1923 年 5 月至 8 月，日本对华出口额不仅明显低于同年其他月份，比 1922 年同期也大有降低，仅为 1922 年同期值的 60% 左右，其他月份均高于 70% 以上，1 月份还超出了 1922 年同期值约 9.3% 的比例。即日本对华出口减少的起止时间与抵货运动的兴衰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总量变化来看，1923 年的日本对华出口总值为 310213 千日元，1922 年的对华出口总值为 380644 千日元。总值减少了 70431 千日元。同比减少了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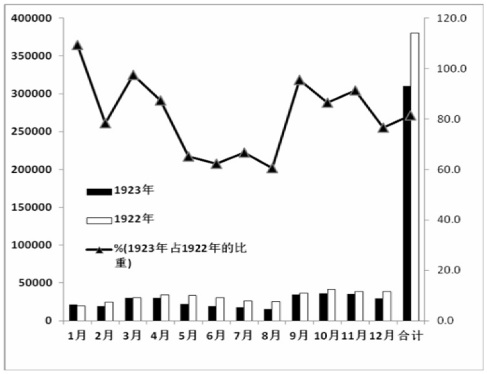

图 1 1922 年和 1923 年日本对华出口比较

（单位：千日元）

资料来源：根据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の基本构造—对外ボイコット运动の研究》，汲古书院 1974 年版，第 219 页，笔者作成。

图 2 是运用中国统计数据分析的结果。自 1923 年 1 月至 4 月，日本对华出口呈渐增趋势。5 月以后出现逐步减退之势。自 6 月至 7 月抵制风潮最盛时，减少也最为明显，7 月降为全年的最低点。

从图 1 和图 2 来看，虽然两者的统计数据并非完全一致，但两者显示的抵货期间日本对华出口减少的趋势基本吻合。即抵制日货运动减少了日本对华出口，对日本贸易确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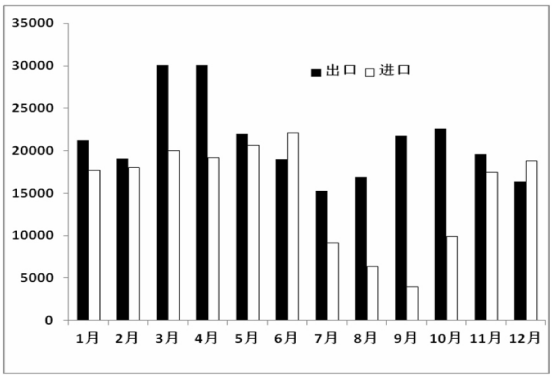

图 2 1923 年日本对华进出口月别情况表

（单位：千日元）

资料来源：子明《日本去年之对华贸易观》，《银行周报》1924 年第 7 期，第 24 页，笔者作成。

注：1922 年对华出口及进口分别为 333520 千日元，186344 千日元。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那么抵货运动给日本贸易带来了多大的经济影响，需分析日本对华出口额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情况。根据《中日贸易统计》的数据，1922 年和 1923 年日本对华出口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14.74% 和 13.9%，降幅仅为 0.84%，影响并不大。

再根据另一组数据对日本对华贸易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表 1 的数据 1 来看，1923 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 1922 年减少 17562150 海关两，减少了 7.56%。从数据 2 来看，1923 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 1922 年减少 20402591 海关两，减少了 8.82%。此分析结果与图 1 和图 2 相比较，差距较大。为进一步确认，需要从中国的进口总额进行分析，减幅仅为 2.29%。可见，日本对华出口额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减少的份额在 2.29% 以内。

表 1　日本对华出口及中国进口额分析表(1922 – 1923 年)

单位：海关两

年份	日本对华出口额 1	减少额 1	降幅 1(%)
1922 年	232319832	17562150	7.56
1923 年	214757682		
年份	日本对华出口额 2	减少额 2	降幅 2(%)
1922 年	231428885	20404591	8.82
1923 年	211024294		
年份	中国进口总额	减少额	降幅(%)
1922 年	945049650	21646763	2.29
1923 年	923402887		

资料来源：根据蔡正雅、陈善林等编《中日贸易统计》，中华书局 1933 年版，第 16 页；及中国进口总值数据根据唐有壬等编《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912 – 1930)》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 1931 年版。笔者计算作成。

为统一对比口径，将上述数据按照当年海关两与日元的比率进行换算。从表 2 可知，1923 年比 1922 年日货对华出口额分别减少 49535.09 千日元和 54088.08 千日元。即抵制日货运动以及因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日本对华出口额的减少是在 54088.08 千日元以内。若进行人均计算的话，人均减少额仅在 0.12 日元及 0.14 日元之间。

抵制日货运动虽使日本对华出口有所减少，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对华经济利益，但并不像舆论所宣称的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的经济基础。再因抵制日货运动遭到中国政府以及日本朝野上下的种种反抵制，最终被取缔。此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和政治效果，但是在这种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团体通过自身的经济外交行为，使维护国家主权、关心民族利益和国民权利的民间经济外交手段得到了发展，作为政府外交的补充力量，对反对政治经济侵略给予了积极的反击。

表 2　1923 年日本对华出口人均减少额

年份	日本对华出口额 1(海关两)	海关两与日元汇率	日本对华出口额 1(千日元)	减少额 1(千日元)	中国人口(万人)	日本对华出口人均减少额 1(日元/人)
1922 年	232319832	1.72	399590.11	49535.09	40000	0.12
1923 年	214757682	1.63	350055.02			
年份	日本对华出口额 2(海关两)	海关两与日元汇率	日本对华出口额 2(千日元)	减少额 2(千日元)	中国人口(万人)	日本对华出口人均减少额 2(日元/人)
1922 年	231428885	1.72	398057.68	54088.08	40000	0.14
1923 年	211024294	1.63	343969.60			

资料来源：同表 1。海关两与日元汇率换算基准按照唐有壬等编《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912 – 1930)》第 3 页计算。

四、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博弈的特点和作用

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博弈的演变过程来看，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不平衡性的特点。日方占有主动性，中方处于被动地位。日方多带有维护日商依靠不平等条约体系获取特权和利益，甚至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性质。中方则带有维护国家权利、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性质。造成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中日双方在政治势力上的差异。对于当时国家综合实力弱小，政治混乱的中国来讲，收回丧失的国家主权一事，虽然是中国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但由于局限性的存在，政府外交的妥协性使得以民间经济外交为首的民间外交发挥了强有力的监督作用。对于日本商界来讲，由于一战后日本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对外经济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这就使得日本商界试图通过民间经济外交手段来间接参与外交事务，同政府对华经济扩张政策保持步调一致，在维护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情况下，以确保已取得的在华经济利益。第二，双重性的特点。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与双方政府及其本身的优劣势所决定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中国商人团体虽然以经济绝交等手段对日本政府及商界给予了经济上的打击，但是，在抵制过程中，一方面，经济绝交的手段使其本身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立场严格制约着抵货运动的兴衰，中国政府在对民众运动失控的担忧之下，再加之日本朝野的压力，使其态度由默许、利用转变为压制和最终的取缔。在此背景下，中国商人团体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坚决抵制转变为最终以“中日亲善”为名，与日方商人团体召开所谓的“联欢会”，中止抵货运动。日方表面上以“中日亲善”为前提和基础开展日中“联欢会”，实质上带有扩张在华势力，将中国作为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的动机，并与政府的对华外交达成一致。

由于民间经济外交对本国政府或他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相对于政府外交而言，是广泛的外交活动领域中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看作是政府外交强有力的补充。政府外交战略是建立在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基础之上的，除了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军事力量为核心、包括人口和地理因素在内的物质要素之外，还有以国民的士气、人心的向背为基础的国家精神要素。因此，中国商人团体依据其特殊的经济地位所展现的抵制运动，是政府外交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最终虽被取缔，但在展示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利益和反对外来经济侵略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商人团体在反抵制日货运动中，通过与日本政府加强联系，使得取缔抵制日货的民意得以传达。这一举动表现出为维护本身经济利益，它与日本政府扩张在华势力的战略部署是一致的，并为日本政府的对华扩张起到了挺头打进的推动作用，也是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的有力补充。

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博弈体现的经济特性来看，具有促进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及推动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掠夺的作用。中国商人团体采取抵制手段的同时，认识到抵制日货并非长久之计，提倡国货的思想逐渐增强，促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日本商人团体开展“反抵制”运动过程中，不仅采用歪曲抵制日货运动性质，煽动舆论奠定民意基础，强化组织联系，督促政府强硬对待，以及分化瓦解抵制运动这些手段，还加强了防止抵货运动再次发生的各种预防措施的研究，使得日本资本主义加强了对中国市场及中国原料的掠夺，并维持了中国市场对日本的开放，起到了推动日本对华政治经济侵略扩张的作用。

注：

①②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等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4、564—565 页。

③《各团体外交运动之昨讯》，《申报》1923 年 4 月 2 日。

④《各团体对日交涉运动昨讯》，《申报》1923 年 4 月 4 日。

⑤《两商总联会积极对付外交》，《申报》1923 年 4 月 5 日。

⑥《总商会劝告日本商业会议所》，《申报》1923 年 4 月 5 日。

⑦《日商会覆总商会函》，《申报》1923 年 4 月 13 日。

⑧《总商会关于外交之通函》，《申报》1923 年 4 月 19 日。

⑨《市民大会之经济绝交计划》，《申报》1923 年 4 月 9 日。

⑩《东报论日本商业近况》，《申报》，1923 年 4 月 29 日。

⑪《美报论日本对华贸易》，《申报》1923 年 4 月 26 日。

⑫李新、韩信夫、姜克夫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 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 页。

⑬《各团体对日运动之进行》，《申报》，1923 年 6 月 2 日。

⑭《商总联会致留日学生会公函》，《申报》1923 年 7 月 21 日。

⑮《总商会关于排日抵货之要函》，《申报》1923 年 7 月 29 日。

⑯《总商会致各业代表》，《申报》1923 年 8 月 18 日。

⑰《今や如何にも黙視し難い渋沢栄一談》，《中外商業新報》1923 年 6 月 15 日。

⑱在华日商团体反抵制运动的具体经过，参见于文浩《1923 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反抵制考察——以日本商人团体为主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10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3—284 页。

⑲《支那排日問題対策》，《竜門雑誌》1923 年 6 月第 421 号，第 60 页。

⑳《日華実業協会と支那排日貨運動》，《竜門雑誌》1923 年 7 月第 422 号，第 61—64 页。

㉑《日商会反抗抵制日货》，《申报》1923 年 6 月 22 日。

㉒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1 页。

㉓《日華実業協会と支那排日貨運動》，《竜門雑誌》1923 年 7 月第 422 号，第 61—64 页《东报载日华协会之议决案》，《益世报》1923 年 7 月 3 日。

㉔《东京通信》，《申报》1923 年 7 月 7 日。

㉕《穏忍するにも限度がある排貨の解決策と日華実業協会の声明》，《中外商業新報》1923 年 7 月 4 日。

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㊺渋沢青淵記念財団竜門社編《渋沢栄一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伝記資料第55卷》,渋沢栄一伝記資料刊行会昭和39年,第212—213、228—229、260—262、263、262、439—440、274—275、274、224页。

㉞《日领请中国取缔国民救国》,《益世报》1923年4月28日。

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㊱李新、韩信夫、姜克夫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㊲《日使竟向我国提出抗议》,《晨报》1923年6月22日。

㊳《日使要求我政府取缔排货》,《晨报》1923年8月11日。

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中华民国八年至十五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351页。

㊶《中日国民代表之会谈》,《益世报》1923年7月26日。

㊷《中日商会见之谈话纪》,天津《大公报》1923年8月3日。

㊸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5页。

㊹《对中日代表会之非难》,《益世报》1923年8月29日。

〔责任编辑:丁　远〕

The Game of Non-Governmental Economic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 Example of Boycotting Japanese Goods Movement in 1923

Yu Wenhao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historical data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inspects the boycott movement against Japanese goods in 192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governmental economic diplomacy. Considering that this boycott movement in fact is a gam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businessmen groups and the governments. The game presents two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one is imbalance, Japan occupie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side was in a passive position. The main reason i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sides in the political forces. The other one is duality, from the Chinese side to resist to the Japanese side anti boycott and then to the Chinese side was banned. This is decided by both the governments and its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lthough this movement di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 Chinese businessmen groups made a positive response agains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ggression from Japan, using non-governmental economic diplomacy and being as a backup supplementary pow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al diplomacy. By non-governmental economic diplomacy, the Japanese businessmen groups participated indirectly in foreign affairs and played a role of maintaining the power of Japanese economic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aggressive policy toward China. Thus it can be seen, non-governmental economic diplomacy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for their governments or other governments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a powerful supplement for the governmental diplomacy and plays a strong supervision role.

Key words: boycott against Japanese goods; play a game; non-governmental economic diplomacy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